

# 寄 语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动态》于1979年创刊，至今已跨越了四十一个春秋，如今，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一个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明确要求，充分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作用与地位。

《科研动态》是由科研处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反映我院科研成果、学术交流、管理动态等内容，为广大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与工作的平台，也是我院同兄弟社科院及高校合作交流的渠道。自创刊以来，《科研动态》对我院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对外交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院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作为全国最大的地方社科院，一直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为进一步反映上海社科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决策咨询能力，贯彻我院“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实现“提质增效”的总目标，科研处对《科研动态》的栏目及重点作了调整，在原有的基础上新设了论文观点摘要和著作成果简介，新设栏目主要为科研成果的展示提供一个平台，同时也为科研人员的发展交流创造一个渠道，借助《科研动态》的传播网络，也可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改版后的《科研动态》栏目主要包括：论文观点摘要、学术会议综述、著作成果简介、科研管理动态和学术交流动态。

科学办刊，及时准确地反映学术成果与科研动态，已日益成为社科院展示学科发展和智库建设的窗口。我院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人文学科基础雄厚，在决策咨询方面更具优势，一直扮演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的角色。2015我院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经过5年的试点建设，

我院智库建设得到长足发展。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科研动态》适应新时代的特点，科学定位、严谨办刊。为适应这种需要，使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对标对表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我们对《科研动态》栏目进行了全新改版。我们期待改版举措助力我院学科发展、智库建设的成果转化、对外交流、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岁月匆匆，转瞬间《科研动态》已步入不惑之年，方寸之地记录了上海社科院发展、前进的坚实步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奋力前行、学科的逐步完善、决策咨询的真知灼见以及一批一批社科人才的涌现。寥寥数页，宛如方志，打开是鲜活的行动，是社科人探索真理的足迹；读到的是专家学者的睿智与学识，是社科人理论创新的点滴记载；合上便是有据可考的历史，是几代社科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求索路。

以刊践行，以文化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社会主义新智库，培养新时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新型学者与研究专家是上海社科院的宗旨，新的《科研动态》将以此为初心，为社科院的发展、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微薄之力！

本刊编辑部

2020年第2期(总第547期)

### 顾问

王德忠 干春晖

### 主编

杜文俊

### 副主编

李宏利 刘亮

### 编辑部主任

魏薇

### 编辑(按姓氏英文首字母)

陈淑丽 范博 李波

杨璇 张闻佳

### 编辑部通讯员(按姓氏英文首字母)

安君涯 陈凌云 丁晓露 何彩平

纪敏 李亚莉 李颖 鲁琳

骆明婷 石永泽 王圣佳 杨慧倩

殷皓洁 尹晓文 张靓 赵祎

周肖燕

### 论文观点摘要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  
——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  
罗尔斯的倾向 (1)

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中国宗教  
研究著作关系考析 (2)

从机构融合迈向社会融合：  
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路径再思考 (4)

空间集聚与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  
的非线性影响 (5)

县域就地城镇化基础与路径研究 (7)

产业政策的央地分歧  
——对改革初期上海华光拉链厂的案例分析 (8)

### 著作成果简介

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9 (10)

上海的创新引领：  
从老工业基地迈向全球城市(1949—2019) (11)

**学术会议综述**

- 以法治保障“一网统管”不断升级  
——“一网统管”建设法治保障  
研讨会召开 (13)
- 第八期近代史论坛“问道于器  
——中国近代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变迁” (15)
- 国内外学者热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  
世界意义 (17)
- 青年汉学家上海论坛会议综述 (18)

**科研管理动态**

- 我院成功举办2020年度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线上专家预评审会 (20)

**主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地址**

黄浦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

200020

**电话**

021-33165079

**邮箱**

kyc@sass.org.cn

**印刷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发送对象**

院内各处室部门

上海市各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

**印 数**

120

**印刷日期**

2020年2月

## 论文观点摘要

#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

## ——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包括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其中差别原则要求经济的不平等要使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最大化。这与福利资本主义的以上诉求至少从表明上看存在明显呼应。正如马克思将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看作是在为放任资本主义辩护，西方很多左翼学者也把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看作是在为福利资本主义辩护，并将《正义论》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意识形态而加以批评。进入二十一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2001出版的《重述作为公平的正义》和2007年出版的《政治哲学史讲义》）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罗尔斯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明确拒斥，对其正义理论受到马克思影响的

承认，以及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同情性理解，使得西方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和罗尔斯政治思想的关系，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以此为主题的文章和著作大量涌现。尤其考虑到当前国内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尝试也多从罗尔斯所设定的框架和议题出发，对西方学界这一融合倾向的反思对我们就更具借鉴意义。

本文择取近年来构成这一潮流的三本有代表性的著作（雷曼（Jeffrey Reiman）的《尽可能地自由和正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亨特（Ian Hunt）的《自由社会主义：一种基于罗尔斯和马克思的替代性社会理想》；布鲁德尼（Daniel Brudney）的《马克思与罗尔斯：分配正义与人的观念》）加以分析和反驳，突出马克思和罗尔斯政治思想的几个重大分歧，初步勾画出

融合二者不应逾越的限度。本文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所发展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有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难以取得成功。本文认为，罗尔斯作为传统社会契约理论的当代继承者，与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

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和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分歧，任何试图融合二者的尝试都不应逾越由这些分歧所划定的限度。

作者：汪志坚（助理研究员）

刊名：《哲学研究》

刊物日期：2019年第4期

供稿单位：哲学研究所

（通讯员：石永泽）

编辑：李波

## 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著作关系考析

文章通过梳理近代来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研究中国宗教的过程中，与晚清上海天主教神职人员黄伯禄的交往，所受黄伯禄宗教著述的影响的史料，从近代中国学和宗教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其中蕴含的跨文化学术交流的具体实践、内在机制和对当代的启示。

首先，经分析史料澄清了黄伯禄的“耶稣会士”以及“汉学家”的两个重要身份。对于前一身份，尽管黄

伯禄受条件限制在去世三个月前才“发愿”加入耶稣会，但“不隶会籍司铎”对于理解他个人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而1899年获法国汉学界荣誉“儒莲奖”，则使得黄伯禄在西方汉学界具有受认可的“汉学家”身份，也扩展了个人著述的影响范围。随后，通过分析黄伯禄的主要宗教著述，概括其研究的一个特点，即“继承了清代‘汉学’考据学派的考证方法，确保了典籍文献引述的相对完整



性和客观性，这是由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与传教士不同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的。

其次，通过区分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中国研究中“汉语研究”与“汉学研究”两个部分，并藉由黄庄二人部分书信的基本信息，指出庄延龄在书信中提出的问题更侧重于中国历史、经籍，以及行政、法律制度，宗教议题等“汉学研究”的范畴。而进一步通过分析庄的相关研究著作，可以发现在“道教研究”、“对孔子贡献的评价”、“中国的穆斯林”、“基督教早期在华历史”这些重要议题上，都受到黄伯禄的影响或启发。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庄延龄对另一位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中国绘画艺术史简介》中一幅所谓“唐代木刻版画”的说明提出质疑，并且在黄伯禄以及上海耶稣会中文藏书楼的中国馆员的

协助下，庄延龄不仅批驳了翟理斯过度阐释与随意，也解决了中国绘画史和基督宗教史的一桩公案。

最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中国天主教耶稣会士黄伯禄之间的学术交往，实际回应了“‘侨居地’汉学家在回到其本土、转型为专业汉学家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研究方法和研究文献发生相应转变的问题”，而需反思的是，对于现在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而言，又当如何重新认识并发掘黄伯禄以及与其类似具有宗教身份的中国“汉学家”和他们丰富的研究著述。

作者：李强（助理研究员）

刊名：《国际汉学》

发表时间：2019年6月

供稿单位：宗教研究所

（通讯员：张靓）

编辑：张闻佳

## 从机构融合迈向社会融合： 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路径再思考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国家战略，标志着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已经进入新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如何推动媒体融合理念与方法的创新和变革，以此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可谓恰逢其时。

有研究致力于分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另有研究从技术布局和突围入手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还有研究将融媒体中心组建模式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了“单兵护散”与“云端共联”模式，“全省部署”和“县级探索”模式，“广电+报业”中央厨房、以广电为先导的移动传播矩阵、组建县域传媒集团、借力省级媒体云平台等模式，等等。

在数字技术和移动网络日新月异的新传播环境下，思考机构与组织平台维度的融合很重要，但是还不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下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形成的网络社会中，必须将媒体组织放在网络

化社会关系中来理解媒介融合。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当下中国的移动传播环境与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要求，思考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路径。

当前，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面对此形势，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对主流媒体是否能够切实对接社会需求、有效构筑传播影响力意义重大。机构融合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础，但不是建设的全部。建设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需要利用新传播技术叠加县域播、视、报、网、端、微等传播渠道，更需要对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与既有基层社会传播网络进行深度融合。

在既有的历史起点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在三个层面上推动从机构融合迈向社会融合的范式



转型。在导向上，从专业生产者为核心转向以用户为核心，重视用户体验，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吸引用户参与集体生产。在功能上，从“+服务”转向“服务+”，打造本地化信息服务平台、集成式政务服务平台、场景化生活服务平台。在定位上，从宣传发布工具转向社会治理与沟通的枢纽，创建集纳与消化基层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多方参与的公共治理中心、增进地方认同的引力场。通过贴近普通百姓的

日常生活，拓展与丰富传播的形态与内容，推动基层社会的沟通与治理，县级融媒体中心才能真正实现与基层社会的深度融合，成为离互联网最近、离大数据最近、离人民群众最近的积极力量。

作者：张昱辰（助理研究员）

刊名：《中国出版》

刊物日期：2019年16期

供稿单位：新闻研究所

（通讯员：赵 祎）

编辑：陈淑丽

## 空间集聚与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目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成为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由于知识和技术的高度密集，创新是信息技术产业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企业也面临更高的技术创新要求和挑战。因此，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创新情况，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对提升信息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不断加深，研究视角有所转变。传统技术创新研究多采用“投入—产出”范式，考察创新要素投入对创新表现的影响。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创新实际上是发生在企业与外部环境不断交互的过程中，因此研究视角逐步从企业内部要素投入转向企业外部的创新环境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从外部环境的地理空间特征出发的研究发现，技术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具有空间集聚

现象。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和邻近对于实现企业间面对面沟通、隐性知识学习和创新有重要作用。从关系角度出发的研究则提出,企业的创新行为嵌入在它与市场上其他企业建立的社交网络之中。通过企业间非正式的社交网络渠道,企业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

本研究以上海云计算产业为研究对象,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云计算企业外部的地理空间集聚和社交网络位置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并综合考虑创新累计效应和产业园区促进作用。作为“十三五”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典型代表,云计算是推动信息技术能力实现按需供给、促进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充分利用的全新业态,是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必然趋势。上海是我国最先发展云计算技术的城市,早在2010年就制定了《上海推进云计算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截至2017年初上海已相继发布三个支持云计算产业的专项政策,云计算技术和收入预计在2018年突破1000亿,成为上海又一千亿规模的新兴产业。毫无疑问,上海已成为

研究云计算产业创新发展模式的典型区域代表。

本研究以上海1966家云计算企业为样本,从地理空间集聚和社交网络嵌入两个维度,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外部因素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空间集聚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呈现U型关系,结合上海云计算产业城市空间分布情况可知,空间集聚对上海云计算创新的正向激励效应目前尚未显现;此外,以董事兼任构建公司社交网络,分析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云计算市场,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呈现出一致性的正向影响。本研究整合地理经济和社交网络两方面的理论研究,不仅丰富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解,其研究结果对上海市政府云计算创新政策和云计算企业创新发展均具有针对性的实践意义。

作者:顾洁(助理研究员)

胡雯(助理研究员)

刊名:《科学学研究》

刊物日期:2019年第9期

供稿单位:信息研究所

(通讯员:殷皓洁)

编辑:陈淑丽

## 县域就地城镇化基础与路径研究

县域作为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流动方向发生转变，人口回流趋势不断增强，而且回流人口在县城定居的意愿较为强烈。与此同时，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当地县城或中心镇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了“白天在县城做工，晚上回农村睡觉”、“工作离土，居住不离乡”的城乡“双栖型”流动；此外，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使很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一些地区也正在探索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较大转变。可以说，县域的人口城镇化过程变得日益复杂，以往用来描述乡村人口就地转型，实现城镇化过程的就地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单纯向城镇集中的县域城镇化都已不能概括当前县域复杂的城镇化过程。在上述背景下，本文认为县域更适合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的分析单元，进而提出了县域就地城镇化概念，将其界定为在同一县域范围

内，农业转移人口向县城、乡镇、农村社区、就地转型的村庄等具有城镇功能形态地区转移实现城镇化的过程。该概念界定不仅扩展了就地城镇化的概念，使就地城镇化不再仅局限于乡村范围；同时扩展了县域城镇化的概念，使县域城镇化不再仅局限于人口单纯向县城和镇集中，两者结合更能有效地支撑整个县域的城镇化发展，形成多元发展路径和模式。总体上来看，当前的人口流动特征、农民城镇化意愿和国家政策是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现实基础。

地方在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城镇化积极性不高、中小城市吸引力薄弱、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突出等。未来，除了从增强农民进城定居能力、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引力、适度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等方面加快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外，关键是要在县域范围内建立起多层次的农业人口转移体系，既要减少农村人口，同时又要留得住人。首先，要着重提

升县城和中心镇的吸引力，包括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就业等多方面，带动农业转移人口重点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促进农民“离土又离乡”，从而减少农村人口。其次，通过资本下乡，促进一般镇、特色小镇的建设，使其成为集聚特色产业、人才的新空间，促进农民“离土不离乡”。第三，针对一些发展基础较好、资源优势突出的特色村、专业村，重点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培育建设一批休闲观光园区、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农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就地转换，形成“不离土不离

乡”的就地城镇化新空间。最终，在县域范围内，全面构筑起以县城、中心镇为龙头，以一般镇、特色小镇为辅助，以农村社区、就地转型农村为补充的多层次县域就地城镇化体系，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带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作者：杨传开（助理研究员）

刊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刊物日期：2019年第4期

供稿单位：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  
（通讯员：周肖燕）

编辑：杨璇

## 产业政策的央地分歧

### ——对改革初期上海华光拉链厂的案例分析

近年来，有关中国产业政策的学术讨论如火如荼。不少研究者主张，仅仅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并无助于积累和增长知识，应当更关注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sup>①</sup>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目前的产业政策研究并没有呈

现政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相反，应当将产业政策作为因变量，其本身的建构过程，也许是比产业政策的效果更值得研究的议题，包括产业政策受哪些因素影响，产业政策与社会条件是否匹配，不同的行动主体如何理解并利用产业政策。



中国的产业政策过程分析，不能缺失对央地关系的讨论，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不同层级和条线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制度缝隙，并认为多重主体会形塑中国产业政策特有的动力机制，但对这一政策过程和形成机制尚缺乏细致的案例分析。

本研究对改革初期上海一家国有轻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和产品升级过程，基于档案资料做了细致分析，呈现中央与地方在产业与企业发展上的目标差异和路径分歧：中央力图对拉链乃至日用五金行业做出整体性调控，认为龙头企业应当担负起行业技术革新、先进技术与设备国产化的任务，坚持差异化生产和错位竞争；而地方政府则面临“产量焦虑”和同伴竞争压力，对于技术路线不明晰的研发缺乏兴趣，更倾向于利用既有的资源储备，生产技术能级低，但市场前景好的产品。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没有激励去追求更高层级的产品研发与生产，认为这无法应对暗流涌动的市场竞争，会丧失行业龙头的优势地位，被兄弟省份的同行企业赶超，甚至影响相关产品的内销与外贸。根据研究进一步指出，这一时

期的财税改革改变了央地收入分享的格局，形成了一种“半计划体制”，地方政府开始有中央计划之外的经济性激励，这种激励会强化地区间竞争，并导致地方政府与下辖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最终偏离了中央对于产业发展的目标设置。

本研究清晰呈现了各场域、各层级中不同国家力量的互动与冲突，国家（state）作为分散的、常常互相矛盾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开展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主义企业的创新激励问题。研究最后指出，如果研究者能多加关注产业政策“落地”过程中，较低层级的政府与企业如何理解、调试甚至扭曲了中央政府的目标，深入分析产业政策与各个行动主体的适配情况，将有助于理解中国产业政策背后潜藏的动力机制。

作者：朱妍（助理研究员）

刊名：《中国经济史研究》

刊物日期：2019年12月

供稿单位：社会学研究所

（通讯员：鲁琳）

编辑：李波

## 著作成果简介

# 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2019

《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年度报告）》是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的标志性成果，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出版16部。著作力图客观、忠实地梳理和记录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总结和概括每一年度中国在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记录，使人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进程有更加清晰和全面的把握，帮助我们从中抽象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脉络。

《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9》聚焦于2018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全面改革与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从执政党的建设、国家制度完善、政府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社会治理等多个角度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面向。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强调要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宪法保障。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呈现系统性改革、结构性优化、整体性推进三大特征。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增强。同时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继续深入、通过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有效形成了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国家制度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不断改革、发展与完善，一方面，国家制度建设受到中国政治发展自身客观规律支配，适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及衍生问题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建设又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心任务与阶段性目标，并统一于执政党的领导。政府机构改革推向纵深发展，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基层治理上，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优势，将党建工作



深入嵌合到基层社会，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基层社会的正向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也大幅推进，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任务目标前进。

在议题、政策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发展与治理、党治与法治、理论与

价值、政策与制度、技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规定将使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发展呈现出独特景观。

作者：刘杰（研究员）等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供稿单位：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通讯员：骆明婷）

编辑：杨璇

## 上海的创新引领： 从老工业基地迈向全球城市（1949—2019）

在理论上，经济增长为什么出现在一些地方而未出现在另一些地方，是自古典经济学以来始终令学界探究不已且日久弥新的密码性问题；在实践中，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年代，上海经济为什么都能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同样也是令人甚感兴趣的问题。《上海的创新引领：从老工业基地迈向全球城市（1949—2019）》，试图对此进行探究和初步解答。

70年来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当数“老工业基地”与“全球

城市”这两张名片，代表了从赶超型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创新发展。上海经济成功跨越“计划”与“市场”并实现长期增长的密码之一，就在于形成了一种系统有效的创新功能和机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外部条件约束下，上海通过创新型资源配置，获得了显著增长。1949年至1978年，在有限度、低水平的经济开放条件下，上海形成了较有活力的“老工业基地”，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创新之路。其中，技术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从旧设备和技术的利用、群众性革新发展为跟进国家技术创

新，扎实推进学习研究应用；组织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利用群众性运动进行劳动效率提高、群众性合理化技术革新建议以及政府、群众、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技术进步，进而演化为科技驱动下的革新。由此，在政府主导的技术、组织或制度创新驱动下，上海成为当时全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中心。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上海开启了以创新引领为先导的经济加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逐渐从工业中心城市转向经济中心城市。在这个进程中，制度改革与创新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进步与综合创新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原动力。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逐步进入深化改革时期，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逐渐转向综合创新。一方面，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实施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体制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努力建立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高新产业核心竞争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的创新与发展均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包括创新概念本身、创新主体之间关系以及创新对外在环境要求等方面的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样的变化，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构想和举措，迫切需要从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寻找问题与答案，而70年来的上海经验则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作者：方书生（副研究员）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供稿单位：经济研究所

（通讯员：何彩平）

编辑：范博

## 学术会议综述

# 以法治保障“一网统管”不断升级

## ——“一网统管”建设法治保障研讨会召开

2020年10月1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一网统管”建设法治保障研讨会在院总部召开。

上海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专班负责人、上海市人口办政委王锋从“三个不断、三个基本、三个逐步”介绍了上海“一网统管”工作成效：平台基本建成、队伍基本成型、体系基本成型；迭代不断进行、融合不断地推进、理念不断坚定；影响逐步扩大、认同逐步增加、成效逐步显现。探讨了如何加强“一网统管”的法治资源供给、法治环境优化、法治底线确保。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教授首先从实践理性和规范体系出发，指出“一网统管”法律保障的必要性和价值，并探讨了行政主体职权配置问题、数据共享规则规制问题和责任设置问题。建议按照法治化原则，区分

政府部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单位，在市场主体数据共享、分享方面的法律权责。

法学研究所李建伟副所长结合《“一网统管”建设法治保障》课题研究，提出两大对策建议：一是制定“1+1+X”“一网统管”政策性规范性文件体系，即《关于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系统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一网统管”系统实施的办法》，和“一网统管”工作涉及重点工作的细则专项制度文件。二是建议制定出台《上海市“一网统管”建设运行条例》，并制定实施“一网统管”推进所需要的机构设置、技术标准、数据共享、数据安全、运行保障和评价监督等专项规定。

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文学国教授分析了“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的关系和差异，以及对于法治保障的

不同要求。分析了城运中心的吹哨人定位，和解决边界管理模糊、盲区和管理的缝隙问题，探讨了“一网统管”法治保障的专门条例、地方立法和城市管理的地区差异和对策建议。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主持工作副主任虞浔提出，应进一步做好城运中心的设置和人员保障，结合蜂窝理论在基层的利用和实践，分析了大联勤的理念和实践情况。

上海市崇明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管旭提出在“一网统管”指挥平台、监控平台、督查平台、协同平台和赋能平台等五大功能定位基础上，用技术革新倒逼政府管理流程再造，实现“高效处置一件事”。高效的城市运行既需要技术层面的“安全锁”，也需要体制机制层面的“安全绳”。

上海市崇明区司法局局长时枫建

议以一个区的实践，例如以崇明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实践为样本，系统提出健全法治保障机制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上海“一网统管”从1.0版到2.0版全面升级中，应进一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一网统管”，让法治成为上海“一网统管”系统工作的一个亮点；建议制定出台《上海市“一网统管”建设运行条例》，并制定实施“一网统管”相关机构设置、技术标准、数据共享、数据安全、运行保障和评价监督等专项规定，支持和保障“一网统管”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上海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不断发展。

供稿单位：法学研究所

通讯员：尹晓文

## 第八期近代史论坛“问道于器 ——中国近代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变迁”

2019年10月19日—20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处协办的第八期近代史论坛“问道于器——中国近代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与会讨论交流，该会议通过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呈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断，并为当前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外联工作提供决策咨询。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教授做了题为《博览会与中国近代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与西湖博览会为中心》的主旨发言。他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物质文化史的兴起，指出近二十年来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从抽象、文本化的文化史研究，转向对物质载体及物质世界的研究。他认为，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中

国近代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它们构成人们近距离观察百年间中国人衣、食、住、行发展演变的最佳窗口；又以实物和工艺的尺子丈量出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主旨发言题为《“问道于器”：辛亥以来国人着装“西化”的成因与经过》。他自述十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服装的西化问题，从而引发对文明史的思考，并指出服装除了实用性以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

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分组进行了主题报告，议题包含了从政治军事、商业经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报告从物质本身的历史出发，探寻背后的文化，揭示隐藏的动力及历史规律。

在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从传媒、政争、工商业等方面对五四运动的产生背景进行考察，指出五四运动是传媒技术、新式教育、政治纷争和近代工商业等因素的复合体，电报、现代印



刷机、铁路航运、新式学堂等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齐小林（中央党校党史部）围绕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军队的无线通信系统展开讨论，指出当时随着中共军队的扩展，其无线通信网一方面已经基本满足各战区之间及各战区内部的通信需求，但另一方面仍面临安全和效率困境，例如机要和报务人员流失造成通信安全隐患、机要系统和报务系统的配合面临效率问题等等。齐小林表示，如何处理技术、制度和人的关系，是当时军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吉辰（中山大学历史系）从张之洞督鄂时期湖北的军械购买与制造来考察中日关系，探讨日械在湖北市场击败德械的过程，认为这从侧面反映了甲午战后日本势力在华的扩张。张文洋（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察了电报在晚清内廷的引入、应用以及相关制度的形成发展。内廷在光绪初年即开始使用电报，中法战争后电报成为朝廷的正式文书之一。他指出电报的商业属性和新技术尺度超出了清内廷的理解与掌控，也改变了中国的信息和管理逻辑。

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社会生活史的结合进一步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和边界。任丛丛、欧玄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中式木工

台刨工艺的发展为例探索技术和社会的互动。报告引用了研究者在河北、山东、贵州、广西等地所做的田野调查，结合对匠人的访谈、总结工匠技术知识，归纳中式台刨的相关特征。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通过考察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农业机械的认识史，探讨近代以来中与外、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乃至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方万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报告关注以水磨为代表的传统水力机械，通过考察其在清末以来的两次“技术革命”中被赋予的新内涵，指出它反映了民族自强追求下的一种技术进步焦虑。

物质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的交叉也提供了新的视野。王果（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报告关注乡村铁路和四川乡村的工业化，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告关注近代中国精糖消费的兴起，王国晋（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报告则从近代钟表照相商号的商业经营来看近代的商业移民和赣南市场。

此外，与会学者对医疗卫生、城市空间等议题也进行了报告和交流。

供稿单位：历史研究所

通讯员：丁晓露



## 国内外学者热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意义

2019年9月11日，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一圆桌会议顺利召开，与会专家聚焦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意义”为主题，围绕中国道路的开创与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百年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最基本经验就是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所谈到的，“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底气。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会委员冯俊教授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罗曼诺夫教授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进入世界前列需要解决三个问题：谁去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会不会得到西方主流承认？如何保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历史传统的传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需要深入研究自己比较优势的成就，以争取一定国际发言权。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名誉所长潘世伟教授指出，当前世界体系中心首次出现由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的迹象，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情形正发生改变。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21世纪将产生世界历史性的参照价值、示范意义和深远影响。

此外，来自牛津大学、比利时根

特大学、图宾根大学、波兰罗兹大学、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天主教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联、山东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解放军国防大学、上海市社联、《光明日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Marx Ventuno)杂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30余名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言。

本次会议是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六个平行圆桌学术会议之一，会议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课题组协办。

供稿单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通讯员：纪敏

## 青年汉学家上海论坛会议综述

2019年9月11日，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青年汉学家上海论坛”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冠梓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研究中心梁怡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王菁、浙江大学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英刚教授，在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针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程及未来发展等问题，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回顾和展

望。

张冠梓研究员围绕哈佛大学三个中国研究机构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转变发表演讲。他指出哈佛大学的三个机构——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可以清晰体现从中国历史文化问题到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焦点的转移，这种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有关系，也和西方根据中国的

变化带来的新的研究视角的变化密切相关。

梁怡教授围绕70年世界中国研究的“变”与“不变”发表演讲。他指出70年间，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地域呈现扩大的趋势、参与研究的成分趋向多元、研究领域间的界限弱化、跨界研究呈现明显地趋势、研究队伍角色的转换、研究工具和手段在创新。但是研究中国学的目的没有改变，带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服务现实需要和制定本国对华政策为目的。

王菁同学围绕世界中国学的规定性就是中国学“是”与“非”的问题发表演讲。她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

中国学一定不再限于被动地作答，而是在平等对话基础上主动引领议题，这是对于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和使命做出的规定。

孙英刚教授围绕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质疑发表演讲。扭转了“佛教存在一个最初版本”这一概念，指出佛教是不断变化的体系，因此不存在所谓最初的佛教，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明，进一步对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全面与国际学界对接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供稿单位：世界中国学所

通讯员：王圣佳

## 科研管理动态

# 我院成功举办 2020 年度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线上专家预评审会

2020年2月6-7日，我院成功举办了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家预评审会。根据我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精神及疫情发展情况，为减少因会议产生的人员往来和直接接触，本次会议首次采用了线上语音方式，在汇总申报活页的基础上，按学科分组组织了4场16位专家参加的预评审会，共计60余位申报老师参加评审会议。

会上，申请人首先对申报项目做了简要介绍及汇报；之后，评审专家就项目申请人的选题、论证方法、行文方式、论证内容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经过紧张有序的组织，本次专家预审会圆满达成了预期目标。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评审专家和项目申请人对本次会议创新采用线上评审方式表示高度认可，一致给予好评，认为既体现了科学防治疫情的要求，又高效便捷地为我院科研人员的项目申报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供稿单位：科研处）